

中国共产党与澳门抗日救亡运动

□尚伟周云

同仇敌忾，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潮。其中，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是“大众救亡歌咏团”和“前锋剧社”。

“大众救亡歌咏团”的主体成员是爱好歌咏的澳门进步青年，团长由共产党员廖锦涛担任。歌咏团每周集中组织选唱《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宣讲歌词中的抗日救亡道理。1936年冬，歌咏团在澳门清平戏院举行公演，雄壮激昂的歌声令许多青年热血沸腾，奋起投身抗日救亡行列。歌咏团还经常深入周边乡村进行抗日宣讲，在街头讲述东北同胞被日本侵略者奴役、压迫的惨状，现场经常是群情激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不绝于耳。

“前锋剧社”由共产党员余美庆等创办，以戏剧、话剧、街头剧等多种形式在澳门及周边村镇巡回演出，进行抗日宣传，足迹遍布石岐、小榄等地。剧社演出的《烙痕》《重逢》等剧目，鲜活生动地讲明了抗日救国的道理，有效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在共产党员及抗日文艺社团坚持不懈、广泛深入地宣传鼓动下，澳门爱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

凝聚力量 共赴国难

由于澳门当局对日态度暧昧，多方限制抗日活动，澳门同胞大多以“救灾”等名义组建抗日团体，开展救亡运动。党在澳门的组织始终高度重视加强对抗日团体的影响与引领。

1937年8月，为统一和加强各抗日救亡团体的活动，廖锦涛、陈少陵等党员倡议召开澳门救亡工作联席会。同月，“澳门学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简称“澳门四界救灾会”）成立，来自澳门中小学校、报社、音乐社、戏剧社、体育会等50多个团体的100余位代表出席成立大会。由于群众基础广泛，“澳门四界救灾会”成为抗战时期澳门开展活动最多、影响最大的抗日救亡团体。廖锦涛以“前锋剧社”代表身份当选理事，并在该会建立了党组织。

“澳门四界救灾会”以筹款赈灾、共拯我受难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为宗旨，主要通过募集资金的方式助力抗战，包括举办义演义赛售卖门票，发起献金捐输，组织商家进行义售义卖等。其在1938年9月4日至10月13日组织的义卖运动，共筹得义款10万余元，是当年澳门筹募救亡活动中前所未有的。

除募集资金外，“澳门四界救灾会”还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如1938年8月发起征集慰劳信运动，组织工作队分赴各学校、团体、单位进行征集。民众纷纷响应，参与者既有70多岁的老人，也有刚满9岁的幼童，至月底，共征集信件1000余封，送往武汉抗日前线。

回乡抗敌 热血尽忠

抗战时期，澳门党组织创立和带动了一批澳门青年团体奔赴抗敌前沿开展战地服务，有的还直接参与战斗。其中，规模及影响较大的是“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和“澳门四界救灾会回乡服务团”（以下分别简称“旅澳团”和“四界团”）。

1937年8月开始筹建的“旅澳团”，是中共澳门党组织创立并直接领导的青年抗战团体，其主要任务是在各地党组织的支持配合下，深入澳门周边县区村镇发动群众，在军民中开展宣传，帮助建立儿童团、妇女会、抗日自卫队等组织。“旅澳团”所到之处，受到当地民众及驻防官兵的热烈欢迎，有力促进了当地抗战局面的发展与转变。

由澳门工委发起，“澳门四界救灾会”通过召开全澳青年爱国团体联席会议成立会议的“四界团”，得到各方积极响应，男女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四界团”由中共党员廖锦涛担任团长，至1940年6月先后组织11个工作队共167名队员赴广东西江、东江、北江及珠江三角洲抗战前沿开展动员群众、战地救护和慰劳抗日军队等工作，有时还与日军进行正面交锋。为加强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根据广东省委指示，“四界团”有百余人加入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深入连排加强士兵思想教育，强化抗战信念。他们还建立了军民合作站，开展抗日保家和军民合作宣传，有效推动了抗战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和影响下，很多澳门青年主动要求入党，党组织不断扩大。“旅澳团”和“四界团”成员的报国献身精神尤为突出，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期间牺牲的就有14人，包括廖锦涛、陈少陵等骨干党员。中国共产党与澳门同胞休戚与共、携手抗战的光辉历史已成为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珍贵记忆。

冀南抗战史上的英勇篇章

——冀南“四·二九”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宋 燕

冀南“四·二九”烈士陵园，位于京杭大运河西岸的河北省故城县建国镇霍庄村北，是为纪念1942年4月29日在抗击日寇“铁壁合围”突围战中牺牲在此地的革命烈士而修建的。陵园内苍松翠柏间安葬着213位烈士。园中心高矗的纪念碑上雕刻着冀南抗日战争领导人徐向前、宋任穷、陈再道、王任重、刘志坚的题词。纪念碑北面的白色大理石壁上雕刻着500余字的碑文，全文如下：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本法西斯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翌年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挺进冀南。和冀南党组织紧密配合，领导人民奋起抗战，挖路沟，筑“人山”，建起冀南抗日根据地，频繁打击敌人，屡破敌人侵华战略。日寇惶惧，经常侵扰，拼死肆虐。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冀南区党、政、军机关及新七旅旅直二十一团，冀南军区特务团，一二九师骑兵团等在武城县霍庄村一带；同时，四分区党、政、军在临清贺伍庄一带被敌人包围。我一二九师骑兵团等部队在武城县运河以西地带，三进三出敌人包围圈。是时，弹雨枪林，狂风蔽日，掩护首脑机关和群众杀出重围。粉碎了日伪军三万余人的“铁壁合围”，打乱了日寇妄图摧垮我冀南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以实现其建立“华北兵站基地”的战略狂想。继“四·二九”后又击败了敌“六·一一”、“九·一二”“合围”扫荡。军民协力，同仇敌忾，敌进我进，我们的工作一直渗入到敌占区，抗日根据地日益扩大，我们越战越强，为冀南人民的抗战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是役，王一夫、范立轩、梁振芝、张利民等干部及战士三百多位英雄儿女壮烈殉国，他们是人民的英雄，为打倒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烈士的革命精神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他们将永远活在人民心里！

先烈用鲜血浇灌的革命之花，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将更加绚丽，激励后人发愤图强，振兴

中华，保卫世界和平。让光芒四射的共产主义事业光照人间，大步走向更加绚烂、更加绚丽的明天。

中共故城县委员会
故城县人民政府
1987年4月29日

碑文简要地概述了“四·二九”抗击日寇突围战的历史背景、激战过程，颂扬了冀南党政军民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表达了对革命先烈无限的缅怀之情。

造“人山”，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

原冀南地区地处华北平原南部，东控津浦线，西扼平汉路，为南北交通之咽喉。又因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为兵家必争之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侵占了德州、邯郸等地，使用“以华制华”的手段组织伪军，妄图长期全面统治冀南地区。

1938年初，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奉命挺进冀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平原敌后游击战。面对无山地依托，无森林隐蔽等诸多地形上的不利因素。副师长徐向前认为广大人民群众是永远可以依托的“大山”，是战胜日寇的伟大力量，创造性地提出把广大人民群众造就成平原上的“人山”的口号，冀南根据地得以迅速发展。到年底，形成了以南宫县为中心，西起平汉路，东至津浦线，北至德石路，南达漳河、卫河，跨冀、鲁两省共50多个县、1万余人基本武装力量的冀南抗日根据地。

“共产党员集合”，狂风助力突重围

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壮大成为日寇的心腹之患。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为达到其建立“华北兵站基地”的目的，对冀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频繁“扫荡”“清剿”“合围”，妄想从根本上消灭冀南抗日根据地。

陈望道：忘我追寻真理，毕生坚守信仰

□孙 洁 胡建涛

时年仅29岁的陈望道以自己的才华和勇气将《共产党宣言》首次以正文全译本的方式与中国的有志青年见面，给遭受劫难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的火种，为中国革命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行方向。

伴随着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擎旗启航“出发”。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回答：有本书特别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这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1949年，周恩来在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对陈望道说：“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刘少奇回忆说：“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这本书于1920年8月首印1000册，9月再次加印，到1926年5月已经印了17版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本书在引领中国新思潮中发挥了重大影响，印证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的论断。

甘当追随共产主义的坚守者。陈望道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回国后，经历了五四运动的陈望道深刻认识到单靠实业救国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需要进行社会改革。如果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那么一切改良措施都是徒劳无益的。1920年，陈望道在译

完《共产党宣言》后，认为“真理的味道非常甜”，此后他一直坚守马克思主义，终身未变。

在五四运动中，陈望道与陈独秀、李大钊以《新青年》《觉悟》为阵地，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进行坚决斗争，并且通过对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有力回击，更加坚定地扛起了马克思主义这面大旗，吸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进入马克思主义阵营。“对一切‘五四’以后以‘新’为名的新什么新什么的刊物或主张，不久就有了更高的判别的准绳，也就有了更精的辨别，不再浑称为新、浑称为旧了。这更高的辨别的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有了马克思主义，便有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陈望道认定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更高辨别准绳，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不受其他思潮所扰乱，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实践问题，并充分发挥其热爱马克思主义的激情，持续翻译马克思主义其他著作，如《空想和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底唯物史观》《劳农俄国底劳动联合》等文章，并且发挥其大众动员能力，向群众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等，甘愿作为追随共产主义的坚守者，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敢当忠于党的事业的践行者。陈望道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愿意

为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敢于毕生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的忠诚与追求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0年，陈望道与陈独秀等人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充足的筹备工作，所以他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一大后，他当选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肩负起上海地方党务工作的重任。此外，他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负责人之一与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发起人，办女校、夜校、外国语学校等，通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做好宣传鼓动工作，启发工人阶级的斗争觉悟。在革命年代，陈望道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先后执教上海大学、中华艺术大学、复旦大学，出色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为党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救国进步青年。当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始终走在抗日救亡的前线。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组建“大学教授联合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进步作家和学生。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坚持“为教育事业是万古长青”的教育理念，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到位，使复旦大学快速进入一流学府的行列，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接班人。



在实施了数次“分进合击”战术失败后，1942年4月29日，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纠集1万多名日军和2万多名伪军，在飞机、坦克、装甲车、摩托车、骑兵配合下，向冀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震惊中外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合围圈北起龙华，南至馆陶，西起垂杨、曲周，东至运河广大地区，矛头直指故城县域内的武官寨（时属山东省武城县运河西）一带。这里驻着冀南区党委、行署，有部队及地方机关干部约7000余人。

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4月28日去太行山开会。军区参谋长范朝利、政治部主任刘志坚鉴于敌强我弱，指示骑兵团和二十一团掩护区党、政、军机关等大部队向南撤退。骑兵团和二十一团官兵边打边撤，下午两点左右撤至何刘屯村附近，眼看无路可退，面临被围歼的危险。危急关头，军区首长根据敌情侦察，作出向西南方突围的决断。骑兵团政委况玉纯亲自充当前锋高喊“骑兵团，共产党员集合！”的号令。

此时狂风骤起，尘土飞扬，遮天蔽日，为突围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骑兵团和二十一团官兵冲锋在前，奋力拼杀掩护大部队向西南突围，在王行杖村勇猛冲破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进至大辛庄村又遇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